

[问题提起]

生活，日常，世相——为了变化的把握

岩本 通弥
IWAMOTO Michiya
翻译：王京

前言——问题的框架

首先我想以俯视的视线设定一下我们为为期两天的日中韩三国国际研讨会“普普通通的日常/变动不居的日常——为何思考，怎样把握，如何记录？”的问题框架。

美国的日本思想史泰斗哈利·哈如图涅（Harry D. Harootunian）在其著作《历史的不安：近代性，文化实践，日常生活的问题（History's Disquiet: Modernity, Cultural Practice, and the Question of Everyday Life）》（日文版kobushi书房 2011年）中追问了战间期世界各地对日常性（Everydayness）展开思考的意义。

哈如图涅认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间的20世纪20年代～40年代，搅乱社会秩序，带来变革的“日常性”这一追问（概念或思想）开始拥有迫切的意义，认真面对这一追问的学者，在德国，俄国等西欧以及日本等地几乎同时涌现出来。这是在资本主义近代化的发展中，消费文化迎来了烂熟期的时代，也是大众拥有构建，表达自己的日常性的历史的能动性（agency）这一事实通过布尔什维克革命得以证明的时代（ハルトゥーニアン2011：5）。比本雅明，齐美尔，鲍里斯·阿尔瓦托夫（Борис Игнатъевич Арватов 1896-1940），海德格尔等人迫近“日常这一神秘”略迟，在日本也出现了今和次郎的考现学，戸坂润的《风俗与思想》（三笠书房，1936年）¹，而仿佛是与齐格弗里德·克拉考尔（Siegfried Kracauer）的《雇员们（Die Angestellten）》（1930年）（クラカウアー1979）遥相呼应一般，日本的青野季吉也出版了《工薪阶层的恐怖时代》（先进社 1930年），以民族志的手法描写了白领阶层的窘态（ハルトゥーニアン 2011：54-55），这些都是全球资本主义及现代性发展的一个侧面。而就同时代性而言，他认为柳田国男等人创建的民俗学这门学问，也是在同样的视线中产生的²，将之置于思想史上相互关联的宏大视野中加以把握。

哈如图涅指出，各种潮流的共通之处在于“挽救业已失去的质性的时间，以知性的形式复活为科学与资本所损害的直接的主体性经验的努力”（ハルトゥーニアン 2011：6）。近代资本主义作为意识形态的最大特征，用本雅明的话来说，是“均质而空虚的时间”（ベンヤミン2015：61）（《关于历史概念》1940年）。而哈如图涅以日本作为事例分析了现代性（近代）³对于非西方地域的意义，强调了超越本雅明的理解：即近代资本主义并非均质，而是包含中心·周边不均等结构的全球性同时代体系。这一认识与其说是宏观结构论⁴，不如说是工业化与城市化发展中微观场面的生活经验及其话语，是生存于不均等发展中的资本主义而获得的经验（樹本 2011：276），他称之为“日常性”，并指出在日本以外的非西方社会中也出现了同样的现象。

1 “生活”——研究对象/生活变化与生活改善

1. 比较史视线下的生活改善运动

本研讨会第一部的主题是“生活”，目的是以生活变化，生活改善为对象，通过对20世纪20~30年代在日中韩几乎同时显出雏形，二战后各自发展的“生活改善运动/新生活运动”的研究，以及与包含冲绳⁵，台湾⁶的东亚各地区的比较，关注其同时代性与异质性，从而全面把握战后日常史性质的生活变化。

在日本，一般认为这些运动是战后在GHQ（驻日盟军总司令部）的指导下开始的，以农业改良普及员或生活改良普及员⁷为促进者（facilitator）的参加型开发运动⁸。然而1934年蒋介石政府倡导的“新生活运动”旨在通过衣食住行改革实现强国的目标，而先于日本内地实施了“生活状态调查”⁹的当时的殖民地朝鲜，为了对抗总督府自上而下的教化政策，1929年在朝鲜日报社的主导下兴起了“生活改新运动”¹⁰。我们希望如果加入比较对照史的观点，我们就能够对这些运动进行俯视的，多角度的探讨。

变革身边的日常这一动向，是战后韩国“新村(새마을)运动”的底流，在日本，1941年的《国民礼法》也对起居，动作等做了详细的规定。二者间的异质性当然显而易见，但其中也存在着某种倾向上的平行关系。聚焦于不值一提的，身边琐碎“生活”的这些运动，无疑对于人们的日常是一种搅乱，对作为对象的日常产生了较大的革命性影响。

2. 多领域对生活改善运动的兴趣

近年，关于“生活改善运动/新生活运动”，不仅在民俗学，也在其他多种多样的学问领域有了更多的研究成果。我们研究团队的渊源是田中宣一编《生活的革命—战后农村的生活改善事业与新生活运动》（農文協 2011年），而几乎与此同时，在日本近现代史领域，出版发行了大门正克编《新生活运动与日本的战后—从战败到20世纪70年代》（日本經濟評論社 2012年），而在中国近代史领域，深町英夫的大作《规训身体的政治——中国国民党的新生活运动》（岩波書店 2013年），也继段瑞聪《蒋介石与新生活运动》（慶應義塾大学出版会 2006年）之后，开辟了研究的新境界¹¹。

日本的“生活改善运动/新生活运动”正如刚才提到的两本书的书名一样，主要指二战后的农村事业及运动。例如认为1934年蒋介石开展的“新生活运动”只是与1955年鸠山一郎首相提倡的“新生活运动”名称一致而已，这样缺乏理解的状况还占据统治地位，令人遗憾。如果将中国，韩国，殖民地时期的朝鲜，台湾的生活改善运动，以及战后冲绳的同类运动放在一起思考，不难看出这是东亚近代共有的现代化过程中的一系列动向。本研讨会的特色在于不把各国的运动视为各自无关的现象，而是放在东亚近现代发展中进行相对化的把握。在日本，“生活改善运动”一般包括总理府系统新生活运动协会的“新生活运动”与作为GHQ农村改革的一环，为实现农村民主化而于1948年开始的农林省系统的“生活改善普及事业”（在改善的现场，二者并无区别）。

也有学者把战间期文部省的“生活改善事业”，或是开展类似事业的内务省的“民力涵养运动”，以及1932年开始的农商务省的“农山渔村经济更生运动”等包含在内，这种情况下，一般把1920年设立的文部省外围团体“生活改善同盟会”看作其起点。其目的是从服装，饮食，住宅到社交礼仪等生活各方面的改善与合理化，都市中流阶层（新中间层）的居住生活的改善被视为是其最主要的对象（久井 2004, 2012），普遍认为这些运动与前述两本书所论述的二战后的农村运动之间存在着背离。

另一方面，例如产业组合中央会等官方团体也开展过类似的事业，各府县或市町村政府也直接组织过改善事业，为了实现生活的改善而组织半官半民团体的例子不在少数，而像经济学者森本厚吉于1922年创立的“文化普及会”那样以民间推动的方式开展生活改善运动的例子也为数甚多（久井

online)。而先于“生活改善同盟会”存在过的，提倡节约减省及废除虚礼的报德社运动，町村规约调查运动以及地方改良运动，如果想视为具有同一倾向的运动也并非不可能。综上所述，确定生活改善运动的“外延”并不容易，但在此我希望重视“生活”这一词汇¹²作为Life, Leben等西欧语言的译词进入近代日语中时的本义。

3. 聚焦“生活”与“普通人”的日常变革

“生活”的基本含义是生存而活动，或是为了生存而进行的各种各样的活动。但即使是长寿，如果不把“生”的品质当做关心的问题，也难以大量出现“生活”这一概念（森本 1921：4；中嶋 1974, 1975）。日本近世的类似表述有“渡世，生业，活计”等，但都只是为了生存下去的方式与手段，或是将人的一生视为从生到死的直线过程。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由内务省主导的“民力涵养运动”¹³，将“培养勤俭力行之美风，增加生产之资金，谋求生活之安定”（直线为笔者所加）作为五大纲要之一。其中值得注目的是，不仅有在地方改良运动中常常强调的作为儒教道德的“勤俭力行”，还出现了“生活”一词。不再停留于之前的观念论，而是正视现实人们的生活，将之视为可以改良的客体之时，生活才能显示出实体性的面貌。换言之，大战后随着工业化的正式展开以及城市人口的激增，居住于大城市的“生活艰难”的新中间层，即仅依靠工资为生的薪金生活者的出现，孕育了“生活”这一全新的概念（岩本 2011）。一方面，家庭收支调查，国势调查等对“生活”进行定量分析的技术得到开发和应用，而另一方面，民俗学作为运用与之相对照的手法，从整体上把握“生活”的学问领域，也在各国诞生（パウジンガー 2005：95）。柳田将民俗分为“生活外形/生活解说/生活心意”三部，他将《明治大正史世相篇》（以下，世相篇）终章的标题定为《生活改善的目标》，颇具启发性。在本次研讨会上，我希望重视民俗学起步时的这一设问的意义。

在致力于提高“普通人”之“生”的这些运动中，最为重要的一点是，民众自己也具有主体性的参与其中，重复着日常的实践。在殖民地时期的朝鲜，为了对抗总督府的教化政策，由朝鲜日报社主导的“生活改新运动”及东亚日报社的“到民众中去（v narod）运动”等，便是其典型。人们的生活是不会仅凭自上而下的政策就轻易变化的，日俄战争之后的地方改良运动也致力于风俗改良，极力宣传废除虚礼，修订或废除旧历，普及卫生观念，但收效甚微，不得不寄希望于下一时代的运动。而这些运动则不同，是由“普通人”进行的居民主体性参与的，具有创造性和社会良心的生活实践运动，这一点我要再次强调。只有通过超前促进人们的消费观念，这一变革才能够得以实现。农林省的农业改良普及员或生活改良普及员，只不过是促进者。而在以战后日本的生活改善运动为“参加型开发”之模范事例的开发经济学或开发人类学的领域，在发展中国家农村开发时应用日本经验而获得成功的事例也告诉我们，推动事业的归根结底是“居民”的内发的动力。我们也不能忘记日韩中等经济快速增长的背后，正是无数“普通人”能动，个性化（vernacular）的实践奠定了其坚实的基础。

4. 为何是“日常习惯的改善”

GHQ希望战后不久重新结成的青年会或妇人会能够彻底革除“国防妇人会”那样的御用团体性质，重视培养不盲从于指导者的，能够自主“思考的农民”。对于经济快速增长长期的历史，例如洗衣机，吸尘器，电视机，电饭煲，电冰箱等的普及，也许仅从家电企业角度，比如发明与市场营销活动来论述的研究将大量涌现，但至少我们民俗学者，从生活者的角度，正耳闻目睹着那些容易被埋没于经济快速增长的阴影之中的“普通人”的生活实践。

然而那一代人已经进入高龄，采访当事者，将之作为课题，现在是最后的机会。他们认识到自己是农村民主化的主人翁并积极改善身边的状况，大约只限于1950年前后到60年代前期。在韩国，

1970年代积极参与继承了战前运动的“新村(새마을)运动”的那一代人数急剧减少。在中国大陆，国民党转移到台湾后人民公社承担了生活改革任务，但1978年开始实行生产责任制后，公社在1983年之前就解体了。在之后的未伴随口号的时代，“普通人”是如何将生活秩序化的¹⁴，这是重要的研究课题。这些都最终将与现在的“此时，此地”相连，但深町提出的问题应该首先得到具体的讨论，即在国家陷于严重的内忧外患的国难之时，为什么会发动改善从举止动作到日常习惯这样看上去是表面的，琐碎的问题的运动，并且能够动员大量民众最终形成全国性的运动呢？（深町 2013：7-8）。

安装简易自来水系统，驱除苍蝇，蚊子，老鼠等家庭害虫，改造厨房（如改良灶台等），开办烹饪讲习会，开展浴室，厕所，排水改良等保健卫生事业，倡导遵守时间，改良起居行为，简化婚丧嫁娶年节等仪式，打破陋习，以至于开办计划生育，避孕方法的指导讲习会等，运动的活动多种多样，而这些与农林省的生活改良普及员及农业改良普及员，厚生省的保健妇等各种要素的关系，其具体情况已经变得模糊。这些活动是通过怎样的过程，按照怎样的发生机制和顺序，进入各个地域，各个家庭之中而被消费的？通过日中韩的比较对照，哪些是一致的，又有哪些是不同的？我们希望能够对“普通人”的生活经验进行详细的记述。韩国的“新村(새마을)运动”，日本没有苍蝇蚊子的生活，中国的厕所革命，在年代与具体状况上各不相同，但都是“普通人”致力提高自身之“生”的运动，通过自觉地把握已经司空见惯的身体动作等极为平常的日常“生活”这一领域，而促使自身的“生”更具活力，这是值得称道的同时代的“新纪元”。

2，“日常”——核心概念/各自的接受与发展

第二日上午的第二部，主题是“日常”，考察这一概念在日中韩各自的接受与发展。本研究项目进行至今，一直未对“日常”这一概念予以明确的定义，这是因为考虑到有着多样的接近方式——正如哈如图涅为我们展示出的宏大图景一样——，不愿限制其范围。但毋须讳言，在其背景中是有着德国民俗学的“日常”概念的（李 2015）。

“日常(alltag)”作为一个具有革命性的概念，从1970年法尔肯施泰因原则以后到80年代末左右，得到较大发展，卡罗拉·利普(Lipp 1993)对此有详细的论述。在与社会学，历史学的交集之处，日常文化的研究变得日益丰富。在“工人文化(Arbeiterkultur)”这种在日本还颇为生疏的领域，其研究成果的积累，也与“日常”概念有着共鸣。各国的国情对日常研究的发展有着较大的影响。

就我知道的事例，比如韩国国立历史民俗博物馆的日常生活(살림살이)研究及其资料库，相关情况我曾做过介绍（岩本 2015；金 2016），在此不再赘述，而只想介绍一下市立的首尔历史博物馆的相关研究与展示。2014年到2017年的特展中，除了以我们上次研讨会主题高层集合住宅为对象的“公寓人生”，还有“首尔的肉店”，“请回答！1994年及之后的20年”，“新林洞的青春——考试村的日常”，“印刷世界——仁岷洞印刷一条街”，“公寓森林北首尔”，“南大门市场”等一系列大胆的组展。博物馆每年都会几乎定期的举办数次关注日常或是日常史的特展，从其韩语版主页，可以免费下载这些展览的展示目录(e-book)。其中“新林洞的青春”描写了预备学校及其学生居住生活的街区的日常，作为民族志十分出色。

什么是民俗学中的“日常”？以下简单引用海尔加·根特(Helga Gerndt)的德国民俗学入门书的内容。

“民俗学是研究较广范围居民集团日常生活的学问。其视线投向过去及现在的文化表现。民俗学追问的，是大多数人觉得理所当然的事情为何会成为理所当然。即，与我们共有生活空间，体验空间的人们，是如何在过去以及现在塑造自我这一存在的。”（根据法桥量日文版翻译）（Gerndt

1997 : 25)

不仅仅是追问日常生活,这里包蕴着追问成为理所当然的过程(日常化)的视线。我在相关报告中,将再次关注阿尔布雷希特·莱曼(Lehmann Albrecht)的“日常的叙述”¹⁵。不仅仅是“普通人”司空见惯的生活这一作为(研究)对象的日常,在此,也包含着如何把握(埋没于日常之中)的“理所当然”这一作为方法的日常的问题。德国的“日常”,在各国民俗学的接受情况不尽相同。到底有着怎样的接受的形式,希望本次国际研讨会能够成为大家相互切磋的平台。

3, “世相”——研究方法/如何把握,记录变化的日常

第二日下午的第三部,主题是“世相”,讨论我们如何从方法上把握,记录变化着的日常。从根特的定义中也可以知道,应该采取的是关注成为理所当然的过程的,包含着变化的接近方式,但问题在于无论我们如何对“此时,此地”进行民详细的族志式的记述,转眼间它就将变质,成为“过去的那里”。笔者也在都市民俗学的名下,关心着每时每刻的现在,但时代是变化的,观察和结论无法长久,是最大的烦恼所在。

而另一方面,提起“世相”,当然是指柳田世相篇中的那个“世相”。该词最初见于斋藤隆三的《元禄世相志》(博文馆 1905年),是新造出来的词,在中国或是韩国是没有这个汉语词的。意思相近的汉字圈内共通的词是“世态”,但“世相”作为新词,主要是想指示时代精神,社会状况或风俗中共通的时代特征,或整体面貌(“相”)(岩本 2002)。柳田也称其世相篇是“作为描写社会之变化,即风俗之书而作”(柳田 1954 : 3),可以说这一用语是聚焦于变化不居的日常的,变化这一侧面的。

“此时,此地”这一稍瞬即逝的日常,和“追究其与眼前新现象之间联系的路径”(柳田1993 : 19)的世相史意义上的日常,怎样才能相互结合起来?为了避免前者的研究变成时间不定,现住所不明,所在地不明的民族志,我们有必要对此展开具体的讨论。

除了日本的几位,其他报告者也许对日常的变化或世相的言及较少。但大家讨论的“生活世界”“生世界”“空间实践”等概念,绝不仅仅是个人的问题。如果没有与外界的联系,生活本身就无法成立,因此从这些考察中我们不但能够看到个人,也能看到与个人相联系的人际关系及社会。“生活世界”不仅仅是处于判断以前的,知觉性的直观的环境,也是主观与他者共生的相互主观,间主观的交流所编织的,具有文化沉淀的日常实践累积而成的世界。

结语

仅凭本次的讨论,无法解决所有的问题。但在“此时,此地”留下足迹,正是哈如图涅强调的“日常性Everydayness”,能够改写我们未来的活生生的经验。

哈如图涅说“都市的日常性生产出来的各种记号,作为生存的现在的个别的经验与其历史性差异的特征,应该理解为‘残像’,是过去‘现实化(actualise)’的痕迹——现在在其中以新的不同的配置而现实化”(ハルトゥーニアン 2011:54)。换言之,“残像”是“过去‘现实化(actualise)’的痕迹”,而现在在不同的配置下现实化,即生活实践对文化¹⁶地方性(vernacular)的再配置。

“日常性所包含的意义,是‘此时’使待机于现在的过去现实化的方法。这不是海德格尔所谓的‘曾在(Gewesenheit)’,而是‘虽被忘记,但又无法忘记的东西’”(ハルトゥーニアン 2011 : 55)¹⁷。对此,我们可以做如下的理解:“使待机于现在的过去现实化的方法”,是指以“过去=文化”为参照的,

现在生活于“此时，此地”的人们的日常实践与现实。为了不让过去成为恶灵，我们必须以日常性的“此时，此地”为起点。

注释

- 1 同 在2000年 刊 行的 *Overcome by Modernity : History, Culture, and Community in Interwar Japan* (日文版 *ハルトゥーニアン* 2007) 中的论述更为具体详实。该书与以日常性思想的世界史视野下的同时代性为宏大主题的《历史的不安》，可以看作是相互呼应的姊妹篇。
- 2 关于柳田，比起 (*ハルトゥーニアン* 2011)，《国民的物、亡灵的出现—近代日本国民主体的形成》(*ハルトゥーニアン* 2010) 中以柳田及民俗学为中心展开了更为详细的议论。他高度评价了柳田《都市与农村》、《明治大正史世相篇》等一系列著作，但也在注4所述的意义上，在与折口信夫并置的脉络中，将民俗学定位为“亡灵的出现”。
- 3 哈如图涅及其译者区别使用了“现代性modernity”与“近代”。在以河上彻太郎等13名评论家于1942年举办的座谈会“近代的超克”为主题的前述 *Overcome by Modernity* 一书中，他认为“近代这一词语，掩盖了艺术、文化、政治等体制的固有性”(*ハルトゥーニアン* 2007 : viii)。
- 4 他同时指出，在资本主义的分断以及碎片化的生活中，“产生了虚伪地保证能够重新获得一体化的话语。指向‘永恒’这一理念的冲动，在工业化逐步发展的20世纪20~30年代，通过马克斯·霍克海默所谓‘崇高的自我欺骗’，正像在纳粹对民族共同体永存的确信，或是在相信超越历史的理念或是价值能力的观念论哲学中可以见到的那样，得到了具体的表现”(*ハルトゥーニアン* 2011 : 7)。
- 5 根据加贺谷真梨的研究，二战后在美军USCER统治下的冲绳开展的“生活改善普及事业”，在以大学为普及事业的据点等方面，受到了美国式 *Home Living Improvement Research and Extension Program* 的较大影响(加贺谷 2017)。在日本本土，二战前以欧洲国家的生活合理化运动为模式的生活改善运动成为基础，二战后与农林省的“生活改善普及事业”及总务省系统的“新生活运动(简朴生活)”相连接并展开的。
- 6 关于日本殖民地时期以台湾原住民为对象的生活改善事业，请参照(山路 2004)。
- 7 最常见的说明是，在GHQ的指导下，以农民生活的合理化为目的，通过1948年的《农业改良助长法》(法律第165号)的实施，由农林省推广到全国的。
- 8 近年这些模式也被开发人类学式的加以应用，在东南亚、非洲等世界各地的开发现场，都出现了改善运动。(太田 2004)对此有详细论述。
- 9 朝鲜总督府的《生活状态调查》，其地域篇从1929年的水原郡起共刊行了7册，进行了计量性的地域分析。在台湾，也先于日本本土的国势调查，于1904年开始了“临时台湾户口调查”。
- 10 作为日本殖民地统治下的运动，1932年开始由朝鲜总督府宇垣一成推进的“农山渔村振兴运动”影响巨大，但1929年朝鲜日报社开展的“生活改新运动”及1931年东亚日报社开始的“到民众中去(v narod)运动”的启蒙性质的刺激，以及受其触动而发展起来的民众运动也有着重要意义。前者开始时强调“增进健康、节约消费、废除虚礼、早起运动、色衣断发、普及常识”等6大项目，但不久变化成为“文字普及运动”。后者的主要目的也在于识字与数学启蒙，但都在总督府的压力下夭折了(松本 1996; 宫本 1998)。此外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这一时期，总督府中枢院对家庭中的儒教式冠婚丧祭等仪式进行了整理及规定，于1934年颁布了《仪礼准则》，为1973年朴正熙大总统时期制定的《家庭仪礼准则》(大总统令第6680号)所继承(丁 2014)，对今天韩国的民众生活依然有着影响。
- 11 此外，在社会设计学领域，有(小関 2015)这样聚焦于专业主妇主导的改善活动的考察，而社会教育学领域的先行研究(久井 2008)在思考对象的外延方面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建筑学领域关于生活改善运动的论文，从大正后期就以展示都市新中间层的生活“模范”而展开，可以说不胜枚举。在此，只提一本，即论述今和次郎的(黑石 2015)。
- 12 聚焦于生活的议论，在关于生活改善的先驱性研究(中嶋 1974)之后，似乎进展不大(本稿脱稿后，参阅了久井2016)。“生活合理化”这一词的流行，根据小关孝子的研究，是从1930(昭和5)年开始，关东大地震之前的生活改善运动为了让生活过得更有文化，也积极鼓励消费与娱乐，但在地震后其论调转向了对质朴生活的提倡(小関 2015 : 89, 64)。
- 13 所谓“民力涵养运动”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以五大项目为核心的各种事业的总称，以1919年3月床次竹次郎内相下发给各府县知事的训令为契机展开。请参阅拙稿(岩本 2008)。
- 14 与中国人民公社的连续性，以及之后的未伴随口号的生活改良实践这一课题，得自田村和彦氏的教示。
- 15 关于莱曼，请参照(Lehmann 2010)(岩本、法桥、及川編 2011)。

- 16 他还指出“形成活生生经验之条件的事物的细节”最为重要で、这样的事物的细节“融入了日常生活”(ハルトゥーニアン 2011: 54)。
- 17 他接下去说“所谓日常性，是不安的形式，是被悬置于半空的瞬间。那是新的现在，是以暴力打断传统，将过去所描绘的潮流与运动悬置的‘历史状况’”(ハルトゥーニアン 2011: 55)。

参考文献

- 李相賢, 2015, 「ドイツ民俗学と日常研究—ドイツチュービンゲン大学民俗学研究所の村についての日常研究を中心に」, 『日常と文化』1号(中村和代・訳)。
- 岩本通弥, 2002, 「世相」, 小松和彦・関一敏編, 『新しい民俗学へ—野の学問のためのレッスン26』, せりか書房。
- , 2008, 「可視化される習俗—民力涵養運動期における『国民儀礼』の創出」, 『国立歴史民俗博物館研究報告』, 141号。
- , 2011 「家族をめぐる二つの生活改善運動—民力涵養運動と新生活運動」田中宣一編『戦後農村の生活改善事業と新生活運動』農文協。
- , 2015, 「“当たり前”と“生活疑問”と“日常”」, 『日常と文化』1号。
- 太田美帆, 2004, 『生活改良普及員に学ぶファシリテーターのあり方—戦後日本の経験からの教訓』, 独立行政法人国際協力機構国際協力総合研修所。
- 岩本通弥・法橋量・及川祥平編, 2011, 『オーラルヒストリーと〈語り〉のアーカイブ化に向けて』, 成城大学グローバル研究センター。
- 小関孝子, 2015, 『生活合理化と家庭の近代—全国友の会による「カイゼン」と「婦人之友」』勁草書房。
- 加賀谷真梨, 2017, 「沖縄における生活改善普及事業の展開と受容」生活変化/改善研究会, 2017年4月15日発表。
- 金賢貞, 2016, 「韓国民俗学は「当たり前」を捉えうるか—韓国国立民俗博物館の二つの民族誌(2007～14年)を中心に」, 『日常と文化』2号。
- 樹本健, 2011, 「訳者あとがき」, ハリー・ハルトゥーニアン, 『歴史の不穏』, こぶし書房, (樹本健・訳)。
- ジークフリート・クラカウアー, 1979, 『サラリーマン—ワイマル共和国の黄昏』, 法政大学出版局(神崎巖・訳)。
- 黒石いずみ, 2015, 『東北震災復興と今和次郎—ものづくり・くらしづくりの知恵』, 平凡社。
- 丁世絃, 2014, 「近代期の韓国における儒教儀礼の変化」, 『東アジア文化交渉研究』7号。
- 中島邦, 1974, 「大正期における『生活改善運動』」, 『史艸』15号。
- 中島邦, 1975, 「大正期の生活論」, 和歌森太郎先生還暦記念論文集編輯委員会編, 『明治国家の展開と民衆生活』, 弘文堂。
- 中野智世, 2008, 「『家族の強化』とソーシャルワーカー—マリー・パウムの『家族保護』構想から」, 川越修・辻英史編, 『社会国家を生きる—20世紀ドイツにおける国家・共同性・個人』, 法政大学出版局。
- ヘルマン・パウジンガー, 2005, 『科学技術世界のなかの民俗文化』, 文揖堂(河野眞・訳)。
- ハリー・ハルトゥーニアン, 2007, 『近代における超克—戦間期日本の歴史・文化・共同体(上・下)』岩波書店(梅森直之・訳)。
- , 2010, 「国民の物語、亡霊の出現—近代日本における国民的主体の形成」, キャロル・グラックほか, 『日本の歴史25日本は何処へ行くのか』, 講談社学術文庫(樹本健・訳)。
- , 2011 『歴史の不穏—近代、文化的実践、日常生活という問題』こぶし書房(樹本健・訳)
- 久井英輔, 2004, 「大正後期・昭和初期の生活改善運動における〈都市〉と〈農村〉」, 『東京大学大学院教育学部紀要』44巻。
- , 2008, 「戦前生活改善運動史研究に関する再検討と展望—運動を支えた組織・団体をめぐる論点を中心に」, 『兵庫教育大学研究紀要』32巻。
- , 2012, 「大正期の生活改善における〈中流〉観の動向とその背景」, 『広島大学大学院教育学研究科紀要』61号。
- , online, 「大正・昭和初期における生活改善運動の概観」, 『生涯学習研究 e 事典』, 最終アクセス日: 2017年4月20日: <http://ejiten.javea.or.jp/content.php?c=TWpRek5qTXo%3D>
- 久井英輔 2016 『生活をめぐる啓蒙と〈中流〉の近代史—大正・昭和初期における生活改善運動に関する検討を中心に』 青山学院大学大学院教育人間科学研究科博士論文。
- 深町英夫 2013 『身体を養える政治—中国国民党の新生活運動』岩波書店。
- 藤原辰史, 『ナチスのキッチン—「食べること」の環境史』共和国, 2016年。
- ヴァルター・ベンヤミン著, 2015, 『[新訳・評注]歴史の概念について』, 未来社, 鹿島徹訳・評注。
- 松本武祝, 1998 『植民地権力と朝鮮農民』社会評論社。
- 宮本正明, 1998, 「植民地朝鮮における「生活改善」問題の位相」, 『史観』139号, 早稲田大学。

- 森本厚吉, 1921, 「呪ふべき二つの生活」, 『文化生活』1巻3号。
- 柳田國男, 1954, 「総説」, 柳田國男編, 『明治文化史—風俗編』洋々社。
- , 1993, 『明治大正史世相篇』, 講談社学術文庫(初出:1931、朝日新聞社)。
- 山路勝彦, 2004, 「『文明化』への使命と『内地化』」, 『台湾の植民地統治』, 学術出版会。
- アルブレヒト・レーマン, 2010, 「意識分析—民俗学の方法」, 『日本民俗学』263号(及川祥平・訳)。
- Gerndt, Helge, 1997, *Studienskript Volkskunde. Waxmann* (ヘルゲ・ゲレント1997『民俗学研究法』)。
- Lipp, Carola, 1993, Alltagskulturforschung im Grenzbereich von Volkskunde, Soziologie und Geschichte. Aufstieg und Niedergang eines interdisziplinären Forschungskonzepts. *Zeitschrift für Volkskunde*, 89.Jg., (カローラ・リップ 1993「民俗学、社会学、歴史の境界領域としての日常文化研究—学際的な概念の上昇と下降」『民俗学雑誌』89巻)